

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背景

郝文海

一、文藝復興（註一）時代的重要性 文藝復興對西洋史的重要性如何？近代史家頗多爭論。以往的史家，大抵頌揚文藝復興為歐洲的覺醒時期，是蓋希臘文化光耀千古，羅馬繼其餘業，猶能持續不墮。惟中古之後，野蠻人縱橫四境，燒殺破壞，精華皆成灰燼。自此愚昧黑暗統治了歐洲。人人愁苦，不見情感的奔放；機智與聰明，幾已閉塞不開。在這種境況中，古代文明在人類記憶中消失無餘，不要說新的創造了。文藝復興重開紀元，宛似人從大夢中醒來，清新的思想，充沛的精力，忽然從天而降。由是文學、藝術、哲學、思想。以至經濟政治，莫不呈現新的面目（註二）。在這種史家的想像之中，文藝復興不僅是劃時代的，而且在歷史中發生了化腐臭為神奇的奇跡。

近代史家大多不能同意上述浪漫的看法。他們相信歷史是延續的，文藝復興的建樹，自亦必須有其淵源。中古一定不如想像中的野蠻與黑暗。由是卡萊爾 Carlyle（註三），麥克伊爾文 MacIlwain（註四），葛克 Cierk（註五）諸名家，羣以發掘中古的史實為能。他們發現中古有承先啓後之功，希臘羅馬的精英，中古未嘗完全遺失，而近代許多新的觀念，如法人，如人民主權，如代議，中古實又為之胚胎。葛克常以「antique modern」形容中古的文物。在近代史家的眼光中，文藝復興不過為中古文明的發揚光大，似乎不必特別為之驚奇歌頌。

平情而論，文藝復興當然不能自天而降，歷史延續之說，理論與事實均有充分的證據。不過說文藝復興有其淵源，並不代表說文藝復興沒有創造，更不是否認文藝復興有其特殊的貢獻與意義。如果因文藝復興有所自而否認它對近代特殊的作用，那又是矯枉過正了。文藝復興的一切，莫不與近代相連續。因之，它的優點及缺點，皆至近代而愈益顯著。欲明瞭近代精神者可以從文藝復興尋其根源；要知道文藝復興所孕育的究竟是什麼，亦可從近代來找尋答案。

更有進者，輕視文藝復興者每謂此不過一擬古的時代。誠然，文藝復興的確以擬古始。不過擬古僅為過渡，擬古之後，仍有創造。以浮士德 Victor Faustus 為例。他是希臘文化的崇拜者，因之認為希臘五行樂手的古船遠勝當時的帆船。威尼

斯政府居然下令仿古制建造一船，並舉行公開的比賽。這是當時人喜歡效法古人的最佳例證。但此後浮士德對造船設計大感興趣。搜集可能得到的一切造船圖案，終於真正改進了航海的工具（註六）。這說明擬古實為創造之始，蓋擬古之後所獲刺激很能鼓勵人作進一步的研究。

二、文藝復興的時與地 文藝復興的時間，不容易肯定的指出它的起迄。杜蘭氏 Will Durant 以一三〇〇至一六〇〇為文藝復興時代（註七）他所以這樣分割，因為十四世紀為意大利經濟的繁榮時期（註八）。沒有這世紀的經濟基礎，將無宏偉的建築，工程學固將無所用之，而其他彫刻繪畫之所以裝飾此宏偉建築者亦將不會發達。就是吟詩修文之士，亦會無人獎助，因而不能勃興。是以人文活動，雖至十五六世紀而大盛，但十四世紀奠定此發展的基礎，所以不能不包括在文藝復興時代之內。

為歷史劃分時代，始終是牽強而武斷的事情。即以上述經濟繁榮而論，其實亦是逐漸而來，並不是一朝一夕產生的。至於最為人稱道人文活動，亦是一樣，雖在十五六世紀得到果實，其種因尤遠。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，中古並未完全喪失。東羅馬的君士但丁堡收藏甚富，西羅馬的著名寺院中亦有所存，祇是中古為信仰的時代，古典文化未能發揮而已。故中古與文藝復興的區別，重在兩個時期觀點的不同。中古重信仰而文藝復興重現世。此一觀點的轉移，甚難確定其開始的年月。而且所謂中古重信仰而文藝復興重現世者，亦是大體而言，我人不能因此謂中古無重現世之人，亦不能謂文藝復興無重信仰之人。歷史有如海潮，每一巨浪，可以看到明顯的水柱，但此水柱何在，又無人可以捉摸。歷史中可見的明顯的水柱，即是歷史中有特殊性的時代。海水在湧動的峯柱之下，仍是一片平衡而且彼此交流。歷史在顯見的各種特殊的時代性之下，亦是上片平衡，亦是彼此延續。文藝復興是此歷史中湧起的峯柱，有目共觀，但此湧起的起訖，無人可以捉摸。而且此湧起的峯柱中之事物，皆是前後延續，以年代來劃分是很不自然的。

近代學者們對文藝復興常有不同的評價，實因他們所注視的對象不同。注視峯柱者自然相信文藝復興高出儕輩，而注視暗流者又自然認為它接古通今，並無特出之處。更說得明顯一些，為文藝復興時代不朽之作所吸引者，無不驚訝於此前無古

人後無來者的超越才華。驚訝之餘，深信此乃再生期的非常現象，由是推論前此期必為昏沉的夢睡狀態。此不僅福祿特爾 Voltaire 及蒲克哈德 Burkhardt 有這樣的感覺，就是十五世紀的意大利人，亦同樣因他那一代不世出的才華而深感自傲。相反的，相信歷史自有其延續性的人，注意於文藝復興時代新觀念新思想根源之所在，無非因為希臘古典作品的重被發現，而此一事件，始自十二世紀，所以有十二世紀的文藝復興之說（註九）。凡注視文藝復興時代民間生活以及一般社會狀況者，恐怕亦都會有同樣的感覺，他們覺得十四世紀的意大利，並不顯得凸出。

不過研究文藝復興的人，必須注視其特出現象。祇是注視特出現象之際，常須提高此非當時普遍現象的警覺，就不會以偏概全了。是以峯柱總是峯柱，為便於說明，姑且依照杜蘭氏的說法，以一三〇〇至一六〇〇為期，此一期間，稱之為文藝復興的時代。

至於文藝復興所佔有的空間，史家的意見也不完全相同。哈金斯 C.H. Haskins 以為文藝復興早在十二世紀即已開始，而其活動的中心，應為法國的巴黎。西班牙為阿拉伯文化的傳遞人，也由它首先釋述回文的希臘作品，故西班牙也是復興重鎮。不過哈金斯承認：十二世紀沒有什麼重要的大師，所表現者都是覺醒的初期現象。

我人如假定十四世紀起進入文藝復興的時代，則活動的中心地點，應為意大利。這是多數學家的傳統看法，此一時期意大利文物之盛，在歐洲史中，惟古希臘為其匹敵。史家因此而覺得：「中世紀為愚昧遲鈍與灰暗的世紀，至文藝復興而始重現輕鬆，進步及自由的世界」，不能謂為無因。區區意大利佛羅倫斯及威尼斯等幾個城市，何以短時間內有這許多英才？這亦許永遠是不能完全解答的問題，正像無法解答我國開元天寶何以有李白杜甫是一樣的。我國常謂才人獨鐘天地靈秀之氣，故其來去，不為時地所限。這是不能解釋的解釋。

文藝復興雖發祥於意大利，但其影響，並不以意大利為限。蓋風氣所播，迷漫全歐，不僅法英起而追蹤，就是瑞士德意志，亦呈現了向所未有的活潑氣象。故本文所述文藝復興的地理背景，以意大利為主，但亦時而涉及其他有關的地區。

三、宗教約束力的衰微 一般的說，十四世紀以後的意大利，上帝雖仍受尊敬，而宗教的約制力却在降落中，威尼斯商

人的格言乃「先威尼斯人，而後爲耶教徒」，明顯的置宗教信仰於次要地位。佛羅倫斯人表面上若重視宗教，骨子裏與威尼人完全一樣。佛羅倫斯要求教士宣傳浪費羊毛爲可以墮入地獄的重大罪惡，使敬畏上帝的工人不敢不經濟使用，藉以降低毛織業的生產成本。它利用宗教以達到好貨利的目標，有雄心的國王也是異曲同工，當信仰與事業衝奪時，都捨棄信仰而維護事業；但當他們臥病床褥之際，却又盼望教士來爲他們祈禱與洗罪。哈布斯堡的查理五世，每以上帝的騎士自居，但教皇聯合法國以制裁他的野心時，他就反對教皇。當時的領導人物皆已重視現世，不很想到未來的天堂世界。這是領導人物超越其羣衆之處。

中古末期，思想家們已昌言教皇非即教會，甚至不能代表教會（註十）。文藝復興時代推波助瀾，認爲反對教皇非即對上帝不敬。自理論言，這一種思辨的理則是正確的。惟就事實言，教皇久已成爲教會的護法，教皇尊嚴的動搖，不能不影響到教會甚至宗教的地位。宗教原係信仰，而信仰又無非爲個人內心的選擇，外在的力量似乎不能發生作用。但中古耶教之所以有無可比擬的約制力，端賴教會的嚴密組織，由此嚴密組織執行教會法，不僅異端受到排斥，即日常生活亦受其規範；教會之稱爲宗教帝國，蓋有由矣。今教會的首腦受到攻擊，其約制力自然瓦解。從茲以後，原先的宗教帝國可以說不復存在了。自從教皇退處自保地位之後，教皇與世俗之主愈來愈爲相似，教皇既失精神勢力，世俗之主乃起而垂涎意大利的疆土。日耳曼皇帝，法國國王，以及西班牙國王等皆欲在此半島分一杯羹，教皇既無對抗的武力，惟有使用詭譎外交，離間強隣，使無一國能完全包圍羅馬。他在羅馬左右設置勢力圈，扶植親信以爲采邑的諸侯，儼然是權力政治中的一位主角。他的行動亦許是不得已的，但使宗教受到很不幸的影響。中世紀末期，教皇已與世俗之主互爭雄長。惟所爭者爲教會財產的免稅權，爲教會職位的獨立化與不受世俗之主的支配，爲教會法及教會的執行，均與宗教有若干關係。在這種衝奪中，縱令教皇失敗，教徒仍會同情他是殉道者。自從參與實際的權力政治之後，完全失去神聖的光輝，他的精神感召力亦日益薄弱。

宗教約束力的降落，對教會來說，自屬不幸的事情。惟自另一方面言，它極有助於近代精神的誕育。我人並非謂文藝復興時代已是近代的開始，亦非謂該時知識分子皆能抱客觀的態度。相反的，當時的學人都是古典主義的信仰者，崇古則有餘

，尙新則不足，故與近代精神相去還是很遠。不過無可否認的，文藝復興是從信仰到科學的過度時期。

我人所謂近代精神，指重視事實的科學態度而言。這種精神的發揚，在神學鼎盛的中古是很受限制的。神學中的天堂，與柏拉圖的精神世界同，使人超越一己而有脫塵絕俗之感。惟因此而沒視現實，或甚至以現實爲虛幻，故事實的眞象永遠爲脫塵絕俗之想所籠蓋，有似霧中之花，不能追視。文藝復興使人回到世俗，富庶者追求生活享受，藝術家追求美，科學家追求現實，一時頗有道德墮落與人欲橫流之憾。但是這都是由中古走向近代必經的途徑。

四、人文學 Humanista 的興起與人性的解放 文藝復興以文學的復古始。而這種復古的傾向，充分的表示於其人文學之中。所謂人文學，對十五世紀的人來說，就是文法學、修辭學、歷史學以及道德哲學的總稱（註十一）。這是大學中的課程，亦是教育的一種方法；其主要目標，在培育有修養的紳士，並使學者能用適當的文字來表達正確的意思。修習人文學的人或則爲中學及大學的教師，或則爲準備演說稿與長於公文的神書。十四世紀之前，並非沒有這種人文學。但十四世紀之前，研習人文者很少以希臘古典文學爲對象，即於羅馬古典文學，閱讀的範圍亦是很窄（註十二）。再說以前習人文學者均爲教士，故文字的運用，多數爲了經義的闡釋。文藝復興時期，因與東羅馬及阿拉伯學人交往已多，學者乃能廣覽博閱，得到許多古希臘及古羅馬書籍。同時，造紙術進步，抄寫便利，書籍的版本，更是大爲增加。而研習人文學者，又大多爲俗人，雖無反宗教的意識，但亦無宏揚經義的目的。因此種種，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學乃有其特點，與中古者大爲不同。

復古運動之始，學人不過爲求文體的變化，有如吾國唐宋八大家之所爲者（註十三）。他們獲得希臘典籍之後，愛其文字清新，乃刻意模仿，務求畢肖。他們研究希臘典籍，多數逐字逐句的求其精解。故文藝復興時代對古典文學的了解，遠較後代爲精細，而在此嚴格訓練之下，文體不變，即教皇亦聘請長於古文爲秘書。以上事實，無非證明復古運動的初期，目標僅在改革文體，實無創造新思想的嘗試。不過接觸古典文藝的人逐漸增多和久受古典文藝薰陶之後，古人的思想與古人的生活方式，亦逐漸爲文藝時代的文人所瞭解，這樣就發生了「溫古知新」的作用，不少人乃逐漸產生了新的思想與新的觀念。初期的人文學者，如彼乞拉克 Petrarch，如薩留坦底 Salutati，如白倫尼 Bruni，如范拉 Valla，幾皆爲文章家，初無哲學

思想。以後克向納 Cusanus，畢孔 Pico 輩，始可以稱為哲學家。亦可知人文學的意義，文字的彫琢實較思想的訓練為多。話雖如此，人文學者雖未建立哲學體系，但仍經常表示他們的生活態度，這是文章家在作品中可以充分流露出來的。從他們所表示的這種態度來看，他們的觀點在逐漸離開中世紀的傳統。他們重視人的個性，認為一己的經驗，感喟、情感，以至遭際，皆有發為文章的價值。孟達內 Mortaigne 說的最為明顯，「我的一切，即是我的哲學之主題」。這是中世紀人不敢有的放肆態度，奧古斯汀的懺悔錄，雖亦詳敘童年瑣事，但那是為了證明人有原始罪惡，並非珍視一己的過去。中古人賤視情感，以為此乃欲念之始，故並不把私生活形諸文字。人文學者剛好相反，以為自己的生活就是文章的好材料。

其次，人文學者強調人的尊嚴與人在宇宙間的特殊地位。彼乞拉克於信札中曾自敘登臨文多峯 Mont Ventaux 以後的感懷：「人知贊美高峯洪流，而不知最值得贊美者實為其一己之靈魂」。畢孔 Pico 謂人有自己選擇其生活的自由，故最為可貴。他敘述一個故事，說上帝創造萬物，最後才創造人。創造萬物時賦每物以特殊的能力，例如賦貓以夜視犬以靈敏的嗅覺等最後輪到人的時候，已無特殊能力可賦，乃以衆能賦人。並對人說：「亞當，爾無固定位置，亦無特殊技能……但爾可以選擇爾所好之位置與技能。……我所授爾之位置，不限在天堂，亦不限在塵世。……爾為爾自己的創造者，爾可以墮落為獸類，亦可發揚理性而為神聖（註十四）。

畢孔為強調人有選擇其生活的自由，甚至認為一切宗教皆崇奉上帝，且同有闡釋宇宙秘奧的價值。這種說法，對宗教自由的理論大有貢獻，然在文藝復興時代尚是早熟的思想。並不能發生什麼作用。

上述觀念的綜合，即後世稱人文主義為個人主義的原因。在此少數人所提示的新觀念中，人性的被尊重最有深刻的意義。在西洋思想中，個人受重視的時代並不多見。古希臘視人為國家中的一分子，故所謂個人，乃是公民，乃是亞列斯多德所說的政治動物。希臘末期城邦解體，伊壁鳩魯及柔諾始自人觀人，然因該時政治混亂，對人的看法皆從「苟全性命於亂世」的觀點出發，也是消極的個人，並無積極意義。其後自羅馬而轉入耶教帝國時代，又自宗教觀人，以為人皆有原始罪惡，現世不過為贖罪階段。耶教帝國時期很長，歐人受此觀念的束縛，對人在現實世界中的意義相當冷淡。描述中世紀的人生觀者

，常以十二世紀聖貝那德 St. Bernard 爲典型。他騎驢經美麗的湖澤，不知欣賞四周風景，惟俯伏驢背，一心想着魔鬼與地獄的可怕，誠恐清麗的風景亦爲魔鬼所幻變。其人着迷於贖罪之說如是之深，如何能了解人生的意義？

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生觀，脫胎於古代希臘，而更偏向於尊重個人，它是以人觀國家，亦以人觀宗教，所以完全是人本位主義。這種人本位主義，以後一直成爲歐洲思想重要的傳統。以人觀國家，故國家成爲人謀求福祉的工具；以人觀宗教，則信仰完全出諸人的自由選擇，教會與國家皆不能予以強制。此一人本位主義的完全意義，自然不是在文藝復興時代一下子發揮的。文藝復興時代的領導人士，但覺其有不妨自我作古的豪邁之氣，而並沒有在哲學上完成一人本位主義的體系。

五、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政治 十四五世紀的意大利，政治方面的表現最令人痛心。意大利人似最懦弱，既不如西班牙人的兇悍，亦沒有法國人的殘忍，故戰場上首先退却者必爲意方。可是意大利自相殘殺起來，又表現得極爲勇猛。一城之內，一國之間，往往兩個望族成爲世仇。兩族子弟以至僕役，各懷刀劍，狹路相逢，即會揮刃死鬪。更不幸的是，意大利半島四分五裂，有共和國，有專制暴君，有各色名稱的小國。它們之間積不相能，由是各結外援，引狼入室的來凌辱自己的同胞。教皇統治着羅馬城，他亦野心勃勃的想兼併鄰近地區。他的政治認識並不比世俗之主高明，一樣的寧肯臣事法國或西班牙，希望在混戰中分一杯羹。在統治者們低能，短見，以及愚昧，貪鄙的種種惡德之下，意大利永呈分崩離析之狀。此但丁大聲疾呼而欲挽回的頹勢，到馬克維尼的時代，實際上依舊絲毫沒有改進，而且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。

大局既無法安定，行政及司法乃日形腐敗。沒有一個政府能制止人民之間的私鬪，亦沒有一個政府能解除人民的痛苦於萬一。救濟恤貧的工作，賴慈善團體以進行；衛生防疫，完全是教會團體的負擔。司法無獨立的法院組織，法律理論雖因學者的研究而進步了，而實際案件的處理反日形落伍。罪以刑逼而成，而且很小的過失，常會受貶面，斷臂，或甚至凌遲的處分。

軍事及外交是當時統治者最關心的事情。但所有意大利小國家均採傭兵制。所謂傭兵，往往是專事劫掠的土匪集團。他們在作戰時則保存實力，經常待價而沽，臨陳之時還會投出較高代價的一方。以傭兵來對抗新採火器的法國軍隊，意大利

的命運可想而知。其實意大利諸小國就是採徵兵制，因幅員過小，人口過寡，也難於抵抗法西等統一的王國。佛羅稜斯僅十萬人，能動員的人數，充其量亦不會超過兩萬。故馬克維尼雖建議全國皆兵的辦法，實施後依舊無濟於事。因為這種原因，意大利諸小國乃更重視外交。而弱國無外交，職業外交家雖極盡蘇秦張儀之才，並不能改變法國及西班牙野心家的決定。更何況歡迎敵人者往往就是意大利自己，故詭譎的外交不過增加國際政治的複雜性而已。

這一種黑暗的政治使多數意大利的知識份子厭棄政治。當時有位潘獨兒斐尼寫了部治家格言（註十五），極力謂智者切勿從政，因為服公職的人常須作偽，而且被人聯想到他犯有貪污、殘暴、忌刻等惡行。他還說：人生快樂的源泉在家庭，在經濟事業、在朋友，而不在國家社會。

意大利政治的敗壞，既如上述，而所以致此之由，論者意見不一。有的說其時商業勃興，成功者不特積貲累萬，且能憑其金錢勢力，插足政治，以是一切皆沾染濃厚的商人氣息（註一六）商人精於計算，事事分辨利害，在此種習慣之下，重利輕義乃為自然的傾向。為此說者，常引俗人在政治中漸佔優勢的事實為證，認為帝王急功好利，故注重效能而不復重視貴族的門第或教士的清望。

另一種說法，以為十五世紀意大利人德行的敗壞，實由於道德觀念的崩潰，而道德觀念的崩潰，文藝復興時代個人主義勃興應為最大的原因。中世紀人人敬畏上帝，即桀傲不馴者亦因懼永墮地獄而知遵守道德規律。十五世紀崇尚懷疑，信仰的作用大為降低。個人從信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之後，物質的欲望大受重視，奢侈淫逸之風，由是大熾，而政治不復受道德的規範，前述陋風乃相繼而起。

這兩種解釋，雖似言之成理，實皆不可深信。俗人政治及個人主義，文藝復興不過開其端。以後的趨勢，實皆愈演愈烈。此兩事如果為敗壞道德的原因，則道德的墮落，必隨時代而俱深，但事實並不是如此。而且就以文藝復興時代而論，教廷受俗人政治及個人主義的影響最少，教廷似應不致腐化，最少腐化的程度應該沒有世俗的政府那樣利害。而事實又大謬不然，教廷的腐敗，亦與世俗政府同。可見意大利政治之病，既不在俗人政治，亦不在個人主義。

從當時意大利人自己的論點來看，他們認為未得統一實為政治的病源，而所以未能統一，其咎皆歸教皇，但丁與馬克維尼，言之最為激烈。自阿齊林諾 Ezzelino de Romano 篡位稱帝，得到政治地位的方法全恃力量。而其後意大利所有的小國，所賴以自全者亦全恃力量，一時蔚為風氣（註十七）。既有許多小國，當然各自為謀，自私乃不能免。人主但知自私，一切因自私而產生的怯於公鬪以及陰狠慘毒等等政治病態相繼而來。不可復止。教皇為羣雄之一，力量不足以掃除羣雄，其利乃在分割與均勢。他的外交政策，常是聯合數弱以反對一強，這是意大利人痛恨他為統一的最大障礙的原因。

平情而論，意大利人雖有統一的願望，而處理實際問題的時候，仍然囿於習慣觀念，先故鄉而後意大利。統治者因地域觀念而保持其地位，智識分子因地域觀念而滿足其虛榮心，意大利云云，不過大家嘴上的名詞而已，風氣形成之後，常有積重難返之勢，讀史者雖為之掩卷嘆息，而主持當時大局者，反以為所行極其聰明。此種似乎聰明而極其愚蠢的行徑，實是製造歷史悲劇的主因。我人且勿為十五六世紀的意大利人悲，再說一說兩個共和城市的政制與政治，以分析文藝復興時代政治思想的背景。

佛羅倫斯 Florence 佛羅倫斯有三個階級，最微賤者為平民，多數為勞工，組成小行會 *arti minori*。其次為富商，組成大行會 *arti maggiori*。其三為貴族，乃是傳統的統治階級。富商的經濟勢力日形膨脹之後，即與平民聯合而爭取政治地位。他們訓練平民，教以戰術，而後進攻鄉間貴族的堡壘。逐一摧毀之後，迫貴族遷居城內，受城邦法的約束。此時貴族的勢力尚盛，惟不肯團結，仍在街頭私鬪。一二四七年，安培弟 Uberti 派獲勝，組織親腓特力的政府。又三年，腓特力死，共和派乃乘機反抗，設置人民領袖 *Capitano del Popolo* 以監督政府，一如羅馬平民官之監督執政官。富商為保障通達羅馬及地中海的孔道，調遣民兵征服匹薩 Pisa 及賽恩那 Siena 兩城。

如此，佛羅倫斯乃出現兩個黨派。共和派稱白黨，貴族派稱黑黨。白黨勝利則黑黨逃亡，黑黨勝利則白黨逃亡，而且互相沒收對方的財富，以為報復。一四九四年法國查理進攻拿波爾斯之時，共和派與之勾結，乃驅逐梅第西而恢復民主政體。這是馬克維尼 Machiavelli 所服務的政府。此一政府初以市議會為主體，執行人員每二月改選一次。以後覺得這樣的政府輾

弱無力，又設終身執政，以主持大計。市議會之下設幾個委員會，和平及自由委員會則主管外交與軍事。這個共和政府，在法國第二次入侵又告傾覆，梅第西族再起掌握政權。

佛羅倫斯是文藝復興的發祥地，文物稱盛，但他的政治是這樣的不安而多變。

威尼斯 Venice 威尼斯亦為自由城邦，惟政府組織則不同於佛羅倫斯。一一七一年，威尼斯在君士但丁堡的僑民大受迫害，開啓戰端。不幸它的艦隊染疫，死亡甚多，未戰而回。市民認為政府領導不當，羣情激昂。富人亦懼自由市的聲威從此降落，極謀改變政府制度，經兩年的研究，完成了一一七三年的憲法。該憲法規定：城邦分六個區 *ward*，每區選兩位領袖。然後每位領袖提名四十人，合計四百八十人，組成城邦大會議。大會議本身沒有什麼作用，惟和戰大計決定時要得到它的批准。大會議在議員中選出六十人，組成元老院，主持城邦的商務，財政、以及外交。六區又選六人組樞密院，不僅襄助行政，「城邦長」*Doge* 代表政府的行動且須經彼等的副署。城邦長的選舉，由大會議選三十四人為選舉團，三十四人又在他們之中選出十一人，當衆討論適當人選而表決之。在上述規定中，平民的政權實無足重視，而城邦長的裁決權也不太大。這個政府體制，實屬寡頭性質。

其後憲法又經數次修正。最重要的一次為一二九七年，規定不是一二九三年以來議員的後裔，無被選舉權。這樣，議員成爲世家。他們之間相互通婚，訂有婚譜，絕不與譜外的人聯姻。寡頭的色彩因而更爲濃厚。平民對巨室這樣篡竊政權，也會強硬反抗，均爲寡頭所平復，所以沒有像佛羅倫斯那樣形成永久的政爭。威尼斯政府的行政效率極高，控制市民的力量也極大，這也是它比較安定的原因。

六、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經濟 意大利之所以爲文藝復興的發祥地，與其城市經濟 *urban economy* 恐有關係(註一八)中世紀以農業爲主要生產方式，故其文化停滯。而十字軍東征之後，意大利的佛羅倫斯 *Florence* 及威尼斯驟形繁榮，富商乃得分享政權，遂使兩城略具民主雛形，文藝亦由此得滋長及新生機會。惟意大利的佔有地利，實爲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的事情，此後則北歐因與新大陸航程較短，荷蘭及英國的港口乃漸趨重要。同時，西班牙因統一而國勢日上，地中海以及遠

東的貿易，乃歸其掌握，意大利的經濟也就衰落下去了。

茲爲便於說明，亦以佛羅倫斯及威尼斯爲例，略予敘述。

佛羅倫斯據羅馬與法國之間的交通孔道，且有通達地中海的水道，自古卽爲意大利重要商埠。野蠻人入侵之後，一度中落，惟八世紀起又逐漸繁榮。它重要的致富之道爲染織企業，它從亞洲進口絲及染料，從英國及西班牙進口羊毛，而後再以製成品售銷世界各地。它的染色技術相當高明，經它染製的成品美麗鮮艷，非其他地區者可以競爭，以是能獨佔該一企業數百年之久。

佛羅倫斯有兩所很大的行會—*arte della lana* 及 *arte de' ci mala*，都自備商船並自營進口，行會經營的方式，除自己染色外，織造則以原料分發城市及鄉村的居民爲之。爲控制人力，它禁止工人移出。有時甚至庇護其他地區逃來的農奴，使之安居。在它這種安排之中，工資自然很低。因之，佛羅倫斯者爲行會經濟，操縱大行會的富商，不僅財力雄厚，並亦因之而掌握政權。

這樣巨大的獨佔企業，自然需要大量的資金，所以不久就有銀行業興起。銀行世家之中，梅第西族 *Medici* 在政治中常據領導地位。此外還有 *Bru Nelleschi*, *Franzese*, *Frescobalái* 等，均極有名。銀行家很容易牽入政治旋渦，因爲他們的債戶，常爲教皇與國王。教廷很多的權益都是銀行的抵押品，教皇的財政乃與銀行家結不解之緣（註一九）。也因爲這個關係，佛羅倫斯的金融巨頭常是堅強的教皇派，他們幫助教皇制裁日耳曼皇帝，以使金融業獲得自由的發展。銀行業曾借給安朋六世約值三千萬美金的鉅款，以助查理 *Charles of anjon* 進攻拿波爾斯 *Naples*，其後卽在該國鑄造金錢，徵收賦稅，並獨佔甲冑、白臘、食油等商業。*Franzese* 助腓力第四爭奪王位，其後卽左右法國財政，以迄十七世紀。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也是佛羅倫斯銀行家的債戶，借款達二百餘萬美金。銀行家這一類投資冒險的風險很大，債戶政治下的失敗會使他們破產。朋尼法斯八世 *Boniface VIII* 被幽禁於法境，曾使好幾家銀行倒閉。也因爲這個關係，佛羅倫斯到十五世紀已漸入衰落時期，陸怕慈謂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，經濟勢力已非鼎盛，實亦有其根據。但一般的說，銀行家在佛羅倫斯始終據顯要的地位，梅第

西是文人學士的恩人，因為當時的風尚，認為結交文人是博取時譽及垂名後世的方法。富豪又常是奢侈風氣的提倡者，他們居室富麗，衣飾講究，而一夕宴會之費，常為寒士幾年的生活費用，馬克維尼責備當時的貴族及紳士，認為他們衣錦食稅，對國家則毫無是處，蓋亦有由。

威尼斯 Venice 以造船業著名於中世紀。歐洲各國的畫舫及商船，幾乎都是由它供應。其餘如鐵器銅器玻璃器皿銀器以及金鑲衣，亦能暢銷各地。它與東羅馬親善，因之獨佔了與黑海沿岸的商業。它因外洋貿易的發達而很早建立海軍，以是海權極盛。它的商業在海軍的保護之下，獲利常至千倍，富庶的情形，甚至超過佛羅倫斯。

威尼斯人的經濟活動，受市的嚴格控制。市區不得設立有碍衛生的工廠，進出口均受細密管理，航運條例規定得極為詳盡，而市府所藏各方面的統計資料，亦很完備而正確。市府的外交報告，都與商務有關。十五六世紀有這樣的知識，威尼斯真不愧為商業王國。在市的治理之下，平民的生活水準，略優於佛羅倫斯，富人亦較佛羅倫斯者為簡樸，它的公共建築宏偉富麗，市政廳尤其輝煌。室內壁畫皆出名家手筆，雕樑畫棟，極盡工細。聖馬克廣場是清除屠戶及貧民窟而後建造的，至今猶為公共的遊息場所。尤可喜者，它在聖瑪麗島設置隔離醫院，實為世界中此類醫院之最早者。它並規定醫師法，對人民的健康似極為注意，在文藝復興時代實為少見的進步措施。

公共的建築固多美奐美輪，私人的住宅却又異常湫隘。似乎威尼斯師雅典之遺意，是以公共建築來象徵市府共和國之偉大。是則財閥雖霸持市府政權，而運用政權的目的，非全為私肥，這是它勝過佛羅倫斯的地方。

由前所述，佛羅倫斯者為行會經濟，而大行會又實為企業家公會。企業家初以其財力控制行會，繼則插足政治。威尼斯者為公營經濟，市議會既掌握重要的對外貿易，亦支配着市內的工業。因之，由市議會產生議員世家，又由此議員世家來操縱市議會及公營經濟。結果佛羅倫斯及威尼斯都形成財閥的寡頭政體。這兩個自由市經濟組織不同的發展過程，應該是今日經濟學者最饒興趣的資料。惟在文藝復興時代，思想家們似乎並不重視此一事實。馬克維尼所常加攻擊者，祇是他們所倡導的奢侈風氣，以及他們因安於逸樂而養成的文弱氣質。

七、文藝復興時代的倫理 文藝復興的倫理如何？很難以一言來作概括。這不僅文藝復興時代如此，其他時代亦莫不然。試想一個時代之中，人物衆多，遭際各異，努力的方向自然亦有分別。出類拔萃者頗多獨創，庸碌者却又隨波逐流；孤傲者以節操自勵，鄙夫則又迷醉於逸樂；此爲每一時代可以有的紛歧現象。舉其一端而強調此乃時代精神，既不公允，亦易使人對該一時代發生錯誤的印象。蓋強調前者，堪稱盛世，強調後者，又將成爲沒落的世紀！杜蘭於其西方文化史中曾云：史家與新聞記者同，常爲戲劇化的事件而犧牲平淡的事實，故大多不能對他們的對象作適當而平衡的敘述（註二〇）。吾人如爲其所欺，真是盡信書不如無書了。

上文所述，並非謂史家杜撰事實。他們所記，都是有證有據，決非向壁虛構。但因強調某一類事例而抹煞其他事例，因此非事實的全面，故容易發生語增的弊病。研究文藝復興時，更須特別提高警惕，文藝復興時代保留下來的遺物及記載都相當完整。自其遺物而言，名畫家雕刻家以至名建築師的作品多數完好無損。遊羅馬及威尼斯者無不爲琳琅滿目的藝術品而深感驚訝。由是遐想數百年前人文薈萃的景象，深信文藝復興必然是一富有創造性的藝術世紀。以言記載，葛西亞遜尼 Guicciardini 的佛羅倫斯史（註二一）詳述當時巨室向銀行家押款的數字，而於人口總數，男女學校的分佈，以至健康衛生的設施，莫不爲翔實的分析。他如十日譚，以及其他諷刺教廷生活的散文，無不刻劃生動，傳爲人文傑作。從這許多記載來看，文藝復興時代似乎奢侈淫蕩的風氣很盛，道德墮落無與倫比。然則瑰麗燦爛的藝術品，固爲腐敗社會的產品，寧非大感不可解之事？

實則我人如能插足於當時意大利的社會，所見者「多數爲辛勤而質樸的農夫。他們不知歌頌女性，不知欣賞「落照」，惟胼手胝足而勞於耕耘。就是藝術大師，達文西以敬畏上帝著稱。在他設計的飛機的圖案之下，自註不能爲魔鬼服務，因而沒有公開發表。他不慕名利的美德，與古今道德家何異？其他藝術家，亦皆忠於所事，畢生不懈，何嘗沉溺於歌臺舞榭？當時一般討論家庭管理的著作，皆認爲鄉居有益於心理及生理的健康，惟爲子女教育的便利，城市亦應有所住宅。家庭用度，務須量入爲出，寧求有餘，不能虧負。凡此論點，頗似我國顏氏家訓。可見奢侈淫逸之風，不過爲宮庭及豪門的生活，未可

謂爲文藝復興時代普遍的現象，更不能謂爲藝術由以建立的基礎。當時道德的敗壞，恐以公德爲甚。而馬克維尼認爲政治行爲未可以道德的標準繩墨，亦是一個旁證。

持平而論，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亦與其他時代同，多數人辛勤耐勞而少數人一擲千金。奢侈云云，淫逸云云，不過社會尖端分子的非常表現，殊不可以偏概全。惟此尖端分子的行爲，影響於社會風氣及一般人觀感者頗爲深鉅。路德 Martin Luther 因教廷腐化而激發了他宗教改革的雄心，馬克維尼因貴族及富商糜爛的生活而深感人性的醜惡。贖罪券的發行，十字軍東征時即紀行之，當時未曾引起責難，而十六世紀行之，却引起激烈的反對。是蓋路德朝聖之後，所見羅馬種種，使他相信德人的施捨，無非爲供應教廷的浪費。馬克維尼謂人可以恕殺父之讐而不能忘奪產之恨，則其有憾於意大利人之媚敵求榮，不難想見。是以儘管多數意大利的農工辛勤簡樸，但少數人的淫逸奢侈仍可以說是當時的重要風尚。

(註一) 桑迪克教授根本反對這個名詞，他認爲時間不能回復，過去者永遠過去。見其論文 Lynn Thorndike: Renaissance or Pre-renaissance in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V (1943) p.65-p.74

(註二) 瑞士學者蒲克哈德所著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中，盛譽該一時期的偉大造詣。Jacob Burckhardt: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, Trans. by S. G. C. Muddlemore (Jnodon, 1878)。

(註三) Carlyle: Mediaeval Political Thought, in 6 Vols.

(註四) MacIwain: Mediaeval Instit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. in Speculum VI (1941) p.275-p.283

(註五) Gierk: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Middle Age, (Trans. by Maitland, Cambridge Univ. Press, 1951)

(註六) Herbert Butterfield: The State Craft of Machiavelli, Collier Books, 1962, p.53

(註七) 學者們於文藝復興的時代大有爭論。有人謂十二世紀已即發人文覺醒運動。見 C. H. Haskins: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. Harvard Univ. Press, 1927.

(註八) 陸不慈持相反的觀點、見 Robest S. Lopez: Hard Time and Investment in Culture, in the Renaissance : A Symposium (N. Y. 1953)

- (註九) Charles Homer Haskins: *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*, Harvard Univ. Press 1927
- (註一〇) 馬獻僚和平的護衛一書，即在闡明此旨。
- (註一一) Oskar Kristeller: *Renaissance Thought*. Harper Torch Books, 1961, p.10
- (註一二) 以謝雪廬 Cicero 之作品爲例，中世紀習知 *Deinventione* 及 *De officiis*，而 Brutus 及信札，則爲文藝復興時代發見者。
- (註一三) Kristeller 云：人文學者之所爲，實爲歐洲人修辭學的傳統，其來已久。又云人文學初非哲學體系。其義皆與余所見同。見同書
- (註一四) 引用 Kresstiller 譯文，同書一二九頁。
- (註一五) Pandolfini: *Trattato Dulla Famiglia*
- (註一六) 見 Von Martin: *Aociology of the Renaissance*
- (註一七) 見 Jacob Burck Hardt: *The Civilization of Italy*, Vol 1. p.3-p.17
- (註一八) 見 Alfred Von Martin: *Sociology, of the Renaissance* (Stuttgart, 1932)
- (註一九) Thompson: *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*, p.47
- (註二〇) 見 Will Durant: *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*, vol IV. p.731
- (註二一) 葛亞亞遜尼略晚於馬克維尼，其所著佛羅倫斯史，對當時的經濟記述最詳，爲這一類歷史的創始人。